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与 “积极的和平主义”

邱 静

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和实践,既有“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内容,也有与“和平”“和平状态”等不加区别地使用的形态,在珍视和平的同时也可能有未能直面日本战争责任的一面。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指导思想并不仅限于“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在和平运动的不同时期,“和平主义”分别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等思潮相关联。近年来,日本政界保守势力宣扬“积极的和平主义”,各代表人物的主张有所区别,但都已走到“和平主义”的反面。与此同时,日本民众中存在着与政府截然不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作为可能遏制政界保守势力的力量,当前日本的和平主义与和平运动应受到更多关注。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和平主义 和平运动 积极的和平主义

* 邱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2)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日本政治思想史”(项目编号:10XNJ018)的阶段成果。笔者非常感谢2015年7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次研讨会上的各位老师和匿名审稿老师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作为战后日本的重要政治思潮,“和平主义”常被看作日本政策选择和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起伏被认为与20世纪90年来以来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右倾化”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社会载体”。^① 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内涵?“和平主义”运动的主体、方向、思想特征如何?如何认识“积极的和平主义”?鉴于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显现的历史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需要更深入的历史及语境考察。

本文主要基于相关日文资料,运用思想史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概述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主要内涵,并在简要梳理战后和平运动思想脉络的基础上,对当前的“积极和平主义”进行比较分析。

一、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内涵和类型

作为西方政治思想概念的“和平主义”(pacifism)主要指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为原则的理念和思想。中国对“和平主义”的理解则往往是褒义的、理想主义的。但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在实践中有众多含义,各个主体对其也有不同的理解,与西方、中国的上述理解都可能存在着区别。

1. “和平主义”的多样内涵。驹泽大学教授西修认为,在有成文宪法的187个国家中,有156个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可以称之为和平主义的条款”,包括如下类型:(1)推进和平政策;(2)国际协和;(3)不干涉内政;(4)不结盟;(5)中立政策;(6)裁军;(7)参加国际组织或让渡部分国家权力;(8)和平解决国际争端;(9)否定征服(侵略)战争;(10)排除恐怖主义行为;(11)放弃作为解决国际争端手段的战争;(12)放弃作为遂行国家政策手段的战争;(13)禁止外国军队通过、不设外国军事基地;(14)禁止/排除核、生、化武器;(15)不保有(自卫之外的)军队;(16)限制军队行动(文官统治);(17)禁止宣传、煽动战争的行为。其中“(11)”的例子包括日本,而“(3)”的例子包括中国。^② 通观该文章可以看到,西修强调“和平主义”是现代宪法的必

^① 包震琴:《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特点》,《国际观察》2005年第5期,第52页。

^② 西修「現代憲法と平和主義」《比較憲法学研究》2009年10月号(通号21)、1—3頁。有趣的是,西修为“12”举出的例子没有日本。

置条款,意在为“摆脱一国和平主义”、自卫队“海外和平合作”进行铺垫。但日本“和平主义”一词涉及的内容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千叶真认为,21世纪初日本存在的“和平主义”有以下类型:(1)反战主义(反侵略、反核武器,但对“自卫战争”表现出一定的理解);(2)实用主义的和平主义(采用和平手段、以实际解决争端或建设和平为具体目标);(3)厌战主义(基于战争体验);(4)网络型和平主义(草根和平主义,全球性);(5)非武装主义(有“非武装永世中立和平主义”的理解,但不一定是“无抵抗主义”);(6)非战主义(主张战争本身的违法化);(7)非暴力主义(亦非“无抵抗主义”,可有基于“和平的生存权”的社会/市民的非暴力防卫);(8)战争废弃主义(军队废止、战争弃绝)。其中,他认为后四类与其说是“绝对的和平主义(*absolute pacifism*)”,不如说是“彻底的和平主义(*radical pacifism*)”,是日本宪法和平主义的本质内容。^①从总体来看,千叶的分类有所重叠,对具体人物的定位也有可商榷之处,但展现了“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并在文章中基于历史脉络指出了其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密切关联。

东京大学教授坂本义和指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有着国民一致认为不可动摇的三个内涵:(1)日本绝对反对,不会进行侵略战争;(2)绝对不能进行核战争,日本绝对不采取增加核战争危险的行动;(3)绝对否定军国主义战争。但他同时指出,战后日本虽然反对侵略战争,但对“自卫战争”的态度并不明确;虽然反对核战争,但不是所有人都对绝对的非武装非暴力有强烈的信念;虽然反对军国主义,但“偏重受害者意识”的批评也是正确的。^②不过,坂本较为一贯的思想是基于保障个人自由的问题意识,认为“与国家的自卫权相比,作为个人人权的自卫权才是第一位的”,^③因此,他认为基于受害者意识产生的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的意识也有其意义。^④可以说,坂本所讨论的是“和平主义”的实际存在方式。

① 千葉真「戦後日本の憲法平和主義の一考察」『平和運動と平和主義の現在』風行社2008年、187—196頁。

② 坂本義和「平和主義の逆説と構想」『世界』1994年7月号、24—28頁。

③ 坂本義和「平和をめぐる一南原繁とその後」『平和研究の未来責任』岩波書店2015年、292頁。(该文初出为『平和か戦争か』to be出版2008年。)

④ 坂本義和「平和主義の逆説と構想」、27頁。此外,坂本强调战争责任意识,在此基础上认为日本可以参加非战斗目的的“古典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但派出的应是与自卫队不同的组织。

概言之,如以上三个例子所示,“和平主义”有广义、狭义、实际存在方式三个层面上的不同内涵。广义的“和平主义”除与“和平”不加区别地使用之外,与“和平状态”也既有交叉重合、又可能不同甚至相背。^①在与“安全”“福祉”“开发”等并提时,“和平(主义)”的含义可能会有不同侧重;但在民众个人感觉中,“和平(主义)”也会被直接等同为“安全”“幸福”。狭义的“和平主义”主要与“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相关,但不同主体可能有不同的出发点和强调点。实际存在的“和平主义”在珍视和平与和平宪法的同时,也有偏重受害者意识、未直面日本战争责任的一面。

2. 战后的“和平主义”相关说法。在上述“和平主义”丰富涵义的基础上,战后以来日本还存在各种与“和平主义”相关的说法。除“积极的/消极的和平主义”外,还有“绝对的和平主义”“彻底的和平主义”“空想的和平主义”“心情的和平主义”“负责的和平主义”“能动的和平主义”“民众的和平主义”“人的安全保障”(human security)等。这些说法涉及不同层次的问题领域,也并不都属于“和平主义”思想,有些甚至表达的是“和平主义”的反面。

“绝对的和平主义”或“彻底的和平主义”通常指“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强调其“理念”或“理想主义”的性质,有时会与“战术的和平主义”^②并提;而后者主张和平主义是现实中值得追求的价值。与此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列宁、毛泽东的主张是通过革命否定战争,最终争取永久和平,这虽与康德的思想形式相异,但二者本质上是相似的。^③

“空想的和平主义”和“心情的和平主义”是批评或否定“和平主义”的提法。如京都大学教授猪木正道称:“战后日本最有害的是‘空想的和平主义’。……自由主义重视国家利益、国防、安全保障等,在这个意义上既反对空想的和平主义又反对马列主义。……空想的和平主义在反对向联合国提供军

① 例如,“战后68年间的和平状态”被安倍晋三内阁用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辩护词,但“和平状态”长期以来是与对“和平主义”的挑战并存的。

② 指左翼政党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斗争,与非武装的“和平主义”不同但可以同路的主张。可参见加藤秀治郎「戦後平和主義を問う——日本とドイツを比較して」『改革者』1991年2月号、3頁。

③ 田畑忍「戦争の論理と平和の論理」憲法研究所特集2「平和思想史」法律文化社1964年、9頁。

事支持的意义上,与军国主义同样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和平的破坏者。”^①使用“心情的和平主义”的东京大学教授北冈伸一主张:“不能将‘和平’与‘非军事’混为一谈”,要做“普通国家中的和平派”。北冈认为,日本可以再军备的逻辑是“日本基本上作为通商国家发展而来的,今日的繁荣与轻武装密不可分。……今日日本的繁荣构造中是有内在制动机制的”。^②与此类似,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等政治家提出了“负责的和平主义”与“能动的和平主义”。虽然这些主张也使用了“和平主义”字样(也有中国学者称其为“新和平主义”),但其内涵已经走到“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反面,实际已经不能被叫作“和平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在《日本国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大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日本最初的和平主义是“外来的”“强加的”“别无选择的”。但是,即便是在战败初期,除了首相币原喜重郎等代表的和平主义思想,日本民众从自身经历出发珍视和平、反对战争的强烈意愿也不容忽视,这并不是靠外来强加或政府命令就可以实现的。正如东京大学教授日高六郎所指出的:“我会有我自己的和平主义,日本民众战败初期也各有自己的和平主义。这种‘自己的和平主义’是非常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比和平宪法还要重要的和平主义吧。虽说这里有不成熟、矛盾、准备不足,但民众的和平主义是存在的。”“我们是在战后初期和平意识的延长线上接受和平宪法的。”^③这种“民众的和平主义”从感性出发,不同于学者或政府的理论,在战争责任意识方面亦有所欠缺,但其存在和作用是不可否定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关注个人生存和尊严出发的“人的安全保障”理念也被介绍到了日本。一方面,对相关研究机构而言,该概念带有超越国家层面的意味,在国际上主要着眼于纷争地区的和平,在日本国内则涉及食品、环境、城市和可持续发展等广泛课题,目前主要着眼于灾害地区的重建。国家政策层面上的战争/和平问题在广义上也属于该领域涉及的范畴,但近年来的研究实践并不以此为主要关注点。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将该概念作为外交政策

① 猪木正道「私が闘った空想的平和主義者」[this is 読売]1999年3月号、239頁、242頁。事实上,被猪木认为是“空想的和平主义者”的大内兵卫、丸山真男等学者也并非“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他们强调的是通过捍卫国民主权避免日本再次走向战争,并提出在核时代战争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情况下,和平主义反而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价值。

② 北岡伸一「心情的平和主義の終焉」[公明]1994年5月号、34—35頁。

③ 日高六郎「日本の平和主義について」[国民文化]1995年3月号、2—3頁。

理念,称“作为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和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的基本方针之一,日本在推进人的安全保障”,^①并称非洲开发会议(TICAD)为其重要实践。也就是说,该概念与“和平主义”既有共通之处,但也有较为明显的差别。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民众自发的相关实践是对和平主义的体现:“在植树、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有不带有政治意图的民间团体开展援助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是由对安保、宪法并不关心的年轻人们在做。……当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实践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等等,以后也还会是这样。但是,从原理上去思考的话,这才是宪法和平主义最大的实践吧。”^②

此外,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和平主义”往往与当时社会运动的主题交织在一起,在实践中体现出更加丰富的内涵。战后日本“和平主义”实际的可能含义包括:非武装、非战、非暴力;反战/厌战、反军国主义、反思战争责任;中立、非武装中立、维持现状/轻武装;全面讲和、社会主义、邻国/亚洲友好;反核(核武、核试验、核电);反对某一战争(朝战、越战);反安保、反军事基地、反美、“自主”;反改宪、立宪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市民社会;基本人权保障、福祉;国际援助、“人的安全保障”,等等。在分析战后日本和平运动及思潮时,既需注意区分和平主义与其他主题,也需要关注不同时期和平主义与哪些主题有怎样的关联。

二、战后日本和平运动中的“和平主义”

目前,国内学界对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有如下大致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从战后占领期开始,一方面宪法中有“绝对和平主义”的规定,另一方面是解除武装后别无选择的“消极性和平主义”;第二阶段是从重新武装到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成为实践与宪法矛盾的“相对和平主义”,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等实现“干预性和平主义”;第三阶段从90年代至今,在右倾化进程中,一方面变为“后和平主义/非和平主义”,另一方面将自己粉饰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这样的分期以日本再军备、保守化的进程为线索,对把握日本政策及其对和平主义的影响有所帮助。

① 「ポスト2015年開発アジェンダと人間の安全保障」(2014年3月)、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hiryo/pamphlet/pdfs/post_2015.pdf、9頁。

② 古関彰一「『平和主義』の実践とは何か」『潮』1997年5月号、84—85頁。

但是,若要把握作为思想及运动的和平主义,上述概括有其局限性。首先,战后日本政府的指导思想本身就很难归于“和平主义”。政策实践更多地印证的是“和平主义”与“和平”等概念在日本被不加区别地使用的状态,难以体现“战后日本和平主义”作为思潮的演变历程。其次,“和平主义”作为重要社会思潮始终存在,并体现出与上述概括不同的特点。例如,在战后初期,日本普通民众的“和平主义”并不“消极”,知识分子的“和平主义”也并不“绝对”。在日本重新武装和高度成长时期,和平主义本身并未因现实与宪法的矛盾而“相对”化,还成为了批评作为“干预”工具的“经济外交”的力量。冷战后,日本民众反对战争、捍卫九条,不但不是“非和平主义”,也体现着与政府不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

目前已有学者在上述框架之外,具体梳理不同时期的代表性和平主义人物和思想。这样的基础工作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但是,许多被称作“和平主义”的人物思想相当复杂,以“和平主义”来概括可能并不准确。例如,在日本学者的研究中,除内村鉴三、安部磯雄之外,植木枝盛、北村透谷等自由民权派,幸德秋水、德富芦花等无政府主义者,堺利彦、片山潜、山川均等社会主义者,与谢野晶子等宗教、文学人士,乃至圣德太子、儒教人士等等,其与反战、厌战相关的思想都会被列为“和平(主义)思想的源流”。^①但事实上,不同人物及时代有其各自的问题意识,并不都是基于“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理念,即使是和平非战的倡导者也可能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在对战后的研究中,矢内原忠雄、南原繁、田畑忍、丸山真男、竹内好、清水几太郎、坂本义和、小林直树等学者都会被称作“和平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们不但思想逻辑多样,而且都与纯粹的“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有一定的距离。宇都宫德马等和平活动家的思想是否可以概括为“和平主义”也同样需要辨析。将“珍视和平”“捍卫民主”“保障自由”“反对改宪”“对华友好”等都称为“和平主义”反映出特定时期各思潮之间的紧密联系,但并未澄清其区别和力量对比。

限于篇幅和积累,本文不拟展开对具体人物的分析。以下将在对战后和

^① 参见千葉真「憲法平和主義の系譜 vs. 「積極的平和主義」」(樋口陽一、山口二郎編『安倍流改憲にNOを!』岩波書店、2015年)等。事实上,千葉本人也提出,内村鉴三有从“义战论”到“非战论”的转变,在日俄战争后并未以积极反战运动的姿态出现,与拒服兵役入狱的矢部喜好等不同。这说明被认为是和平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也仍可能有研究空间。

平运动的梳理中,对和平运动的思想脉络进行初步讨论。^① 可以看到,在前述的三个阶段中,“和平主义”体现出了与前述概括不同的特点。

1. 战后占领期。成立于1949年初的学者组织“和平问题谈话会”(“平谈会”)常被看作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起点与“和平主义的象征”。作为知识分子的“悔恨共同体”,平谈会主张全面讲和、和平中立、加入联合国,反对军事基地。但作为一个团体,平谈会“和平中立”的重点并非消灭武装,而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在两个世界之间寻找“中立”的可能性。

实际上,这与战败初期学者们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1950年的一个著名事件是主张单独讲和的首相吉田茂骂主张全面讲和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曲学阿世之徒”。该事件的背景是在1946年对新宪法草案的讨论中,政府出于保留天皇制等考虑决定接受放弃军队的条款,当时首相吉田的解释是连自卫权也全部放弃,理由是过去曾多有侵略战争假自卫权之名而行。对此,南原在议会质询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表示在人类仍可能会有战争的现实下,应考虑“作为国家的自卫权,以及必要的最小限度的兵备”。^② 当然,南原此说与后来的所谓“正常国家化”“政治大国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包括对天皇制等意见在内,他的基本主张是在对过去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捍卫国民主权,这在主张全面讲和时也没有改变。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是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但并不是“和平主义”的。

2. 20世纪50—80年代。在时为和平运动家的清水几太郎看来,战后和平运动的第一个时期为1945—1950年,其最大的成果是《日本国宪法》。第二个时期为1950—1960年,围绕讲和问题出现了“全面讲和论”与“单独讲和论”之争,和平运动可分为:(1)与中国、苏联的复交运动;(2)反对军事基地的运动;(3)禁止原子弹、氢弹的运动;(4)宪法拥护运动。^③

从实际情况看,上述运动并不必然是“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和平主

^① 虽然和平运动中的思想往往被统一看作是“和平主义”,但“和平主义的发展脉络”与“和平运动的思想脉络”实际并不完全相同,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内容,但同时也并不仅限于前者的框架,本文着重讨论的是后者。

^② 「帝国議会議録 第90回貴族院本會議 第24号(回)昭和21年08月27日」国立国会図書館、http://teikokugikai-i.ndl.go.jp/cgi-bin/TEIKOKU/swt_list.cgi?SESSION=46700&SAVED_RID=1&MODE=1&DTOTAL=24&DMY=46730。

^③ 清水幾太郎「安保反対運動の現状——憲法問題研究会における報告」『世界』1960年1月号。清水在战后初期是积极的和平运动家,但安保斗争受挫后于1965年前后退出宪法问题研究会,90年代转向主张日本拥核,但其思想也无法简单概括为“民族主义”。

义”。例如,同中国、苏联的复交运动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与社会主义运动、民主运动、反美运动联系在一起。反基地运动在反美的同时,也是劳动运动、护宪运动、反对强征土地的市民运动。简言之,这些运动既有与和平运动重合的部分,同时也包括多样的诉求;既有国民自发的努力,也有左翼政党的参与;既有大众/阶级运动导致和平运动分裂的情况,又有大众/阶级运动被淹没于和平运动的一面。

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被认为是最有代表性的和平运动之一,该运动也是由各界多方面的活动组成的。1954年3月,日本渔船在美军氢弹试验中受到核辐射伤害。日本民众迅速自发开展反对核试验、核武器的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超过3200万。1955年9月,“原水爆禁止日本协议会(原水协)”正式成立。相关运动在反核武、反基地、救助受害者之外,也有反对安保改订的主张,是“在战争体验=原爆体验的基础上,作为和平宪法的、战后民主主义的也就是亚民族的和平主义而发展的”。^①自20世纪60年代起,运动各方围绕是否应禁止一切核试验、社会主义国家的核试验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导致1963年运动分裂,1965年结成“原水爆禁止日本国民会议(原水禁)”,与“原水协”形成并立之势。直到80年代,相关运动仍受此影响。但在此之外也出现了地方自治体发起的反核都市运动,反核电也开始成为运动的重要主题。

护宪运动在日本再军备、保守势力谋求修宪的严峻形势下出现,其最集中的关注点是规定了“和平主义”的宪法九条,但相关运动包括市民和平运动、左翼政党反改宪运动和知识分子护宪运动,并不必然是以“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左翼政党护宪运动(重要团体有“拥护宪法国民联合”,1954年成立)在“非武装中立”思想下更倾向于“反对修改和平宪法”,而知识分子护宪运动(重要团体有“宪法问题研究会”,1958年成立)则更倾向于捍卫宪法的国民主权原则。普通市民除既有运动之外,在“60年安保斗争”中也以“谁都可以参加的无声之声会”等方式展现自己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和平运动在组织上、思想上都开始以更加独立的方式出现。1965年4月,在鹤见俊辅、小田实、高畑通敏等人的策划下,

^① 武藤一羊「新理念を模索する平和運動——日本の平和主義からの脱却をめざして」[月刊労働問題]1966年8月号、65頁。武藤指出,在战争体验未能结晶为明确的战争认识的情况下,这种“日本的和平主义”与普遍人类体验和国际主义相联,但同时有其暧昧和无力的一面,应探索其与新的国际主义和劳动运动方针的结合。

“越平联”（“给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举行了第一次游行。“越平联”不设统一组织，各地自发成立，到1968年全国已有组织350多个。运动主体除劳动者、学生和文化人之外，还包括各领域的普通市民。除每月举行定例游行外，“越平联”还在《纽约时报》等刊登反战广告，组织援助美军逃兵等形式独特的活动，直至1974年1月解散。在组织上，“越平联”自成立时起就具有超越日本既有的左翼运动框架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自觉意识。在思想上，其最基本的口号是“不要杀人、不要让他们杀人”。骨干活动家吉川勇一对“越平联”思想的概括是：“鹤见的‘好的实用主义’和非暴力、市民不服从的思想，小田的‘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的视角，个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作为个人本身去拒绝有愧于良心之事的想法，还有被日共开除者的马克思主义吧。这些思想是浑然一体、各安其位的。”^①

1973年，在冲绳、东南亚问题和国际和平运动的背景下，“日本和平学会”成立，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66年的“日本和平研究恳谈会”（主要成员有川田侃、石田雄、关宽治、坂本义和等）。其指导思想包括：（1）“和平”是一个过程，是以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斗争，也是针对结构性暴力的斗争。（2）“和平研究”是要将和平与平等、正义的问题联系起来，通过研究彻底否定“以强力致和平”的理论，致力于“以非暴力的方法达成永久和平”。（3）“日本的和平研究”以宪法第九条和被爆体验为原动力，对“权力政治的现状”及核军备竞赛”提出敏锐批评，对亚洲开发与和平乃至南北问题有强烈的关心，要反省战争中对亚洲成为加害者的事实，防止经济大国日本再次成为加害者。（4）和平研究要经得起科学检验，同时也有必要是“批判的科学”；要与和平运动有明确的界线，同时也必须注重研究者之间及研究者与民众的联系。直到80年代，学会研究主要是以和平运动、和平教育、和平保障、“政府开发援助”批判等和平实践活动为着眼点的。^②

3. 20世纪90年代至今。20世纪90年代，在“企业社会”和冷战终结的背景下，和平运动主要以市民运动方式围绕世界性课题而展开。例如，日本和平

^① 「ベトナム戦争反対を掲げた市民団体「へ平連」の元事務局長吉川勇一さんに聞く」朝日新聞社「週刊20世紀1965」1999年7月号、旧「へ平連」運動の情報ページ、<http://www.jca.apc.org/beheiren/jiten10-20seiki.htm>, 2015-09-01。

^② 初瀬龍平「日本平和学会40(+1)年回顧と展望」日本平和学会「平和研究」2014年(第43号)、128—133頁。

学会在 80 年代末提出了人类利益与“国际福利社会”的视点,成为 90 年代后学会的研究方向。^①但也有学者指出,日本在越战后对卷入美国战争政策的危机意识渐弱,“伴随着基地整编,基地斗争、和平运动有所倒退。取而代之的是民众中形成了强烈的‘维持现状’的和平主义意识”。^②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求物质丰富的过程中,“和平主义”只被当作为实现自己更好生活而存在的事物,许多日本民众由此出现了既支持宪法九条又支持自卫队的矛盾态度。而“物质丰富”的背后有着“反·和平主义”,“这并不是对和平主义的渐渐架空,而是积极进行与和平主义相反行动的‘反·和平主义’”。^③不过,也有学者基于舆论调查结果指出,“各处也表现出了‘接受现状’的倾向,不过,虽然内容、程度有所区别,但在对安保条约、自卫队、PKO 等进行思考时,宪法第九条与和平主义的理念是被当作判断标准和指针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国宪法在国民(学生)中间已经扎下根来,其规范性是有生命力的”。^④近年来的相关舆论调查仍然印证了这一情况。^⑤

在此阶段,除反基地、反核运动之外,护宪运动也在继续。例如,相关知识分子团体有“全国宪法研究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法律部会”等。2001 年 9 月成立的“宪法再生论坛”号召“超越暴力的连锁反应”。^⑥2004 年 6 月成立的“九条会”以“争取‘保卫第九条’的过半数舆论”^⑦为目标,采取各地各界自发设立草根团体的方式,2014 年,已有 7500 个团体。从总体上看,到 2010 年前后,这些团体的思想反而比较偏重于和平主义,宪法问题研究会对国民主权的强调未被充分发扬。

① 初瀬龍平「日本平和学会 40(+1)年回顧と展望」、130 頁。

② 渡辺治「企業社会と「平和主義」の形成と成熟」『法学セミナー』1995 年 8 月号、52 頁。

③ 浦部法穂「『反・和平主义』の五十年」『法学セミナー』1995 年 8 月号、64 頁。

④ 井端正幸「沖縄の大学生と「平和主義」」『法学セミナー』1995 年 12 月号、16 頁。PKO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但在日本亦被政界保守势力当作推进海外派兵及修改宪法的借口。

⑤ 例如,在共同通讯社战后 50 周年前夕的调查(1994 年 7 月)中,认为宪法应“存续”的为 55%、应“改正”的为 34%;在战后 70 周年前夕的调查(2015 年 7 月)中,认为宪法应“存续”的为 60%、应“改正”的为 32%,不主张改宪者认为宪法最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战争放弃、和平主义”(88%)。2015 年各媒体的相关调查数据有所不同,但除读卖和 NHK 外(二者对于修改 9 条亦为反对超过赞成),认同不改宪者均超过认同改宪者。参见「改憲 32%、変えない 60%/経済発展、平和を評価/「平和主義」定着」(2015 年 7 月 22 日)(47NEWS, <http://www.47news.jp/47topics/e/267328.php>)等。

⑥ 参见加藤周一、井上ひさし、樋口陽一、水島朝穂編「暴力の連鎖を超えて——同時テロ、報復戦争、そして私たち」(岩波ブックレット No. 561)、岩波書店 2002 年。

⑦ 「『九条の会』からの訴え」(2006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9-jo.jp/news/news_index.html, 2007-05-18。

2012年以来,第二次安倍内阁强行推进“集体自卫权”,意图修改宪法。日本民众纷纷发起抗议行动,声势之大为“60年安保斗争”以来所未见。^①当前运动同样具有主体、诉求、思想多样的特点。除共产党、社民党、民主党等政党及相关团体/人士(如自民党前高官、创价学会成员等)外,参加集会的既有各地各界工会组织(劳联)、教师组织(教组)、法律家组织、学者组织、学生组织、原水协/禁、九条会,又有妇女联合会、“母亲会”、商工联合会、医疗生协、年金者联合会、出版/新闻界联合会、音乐人协会、导演联合会、和平遗族会、日中友好团体、在日朝/韩人团体等丰富多样的组织,还有众多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国民。在抗议集会中,最为突出的诉求是“不要战争”“捍卫九条”,反对解释改宪、反对强行表决,要求安保法案废案、安倍辞职。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反对重开核电站、反对军事基地、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邻国友好、充实福利制度等诉求。在思想方面,左翼政党与各界国民的诉求以“不要再次把年轻人送上战场”为出发点,体现了对和平主义的珍视。在反安保法舆论斗争中起到很大作用的“立宪民主会”(2014年成立)等学者团体在指出安保法案作为政策的非现实性之外,突出强调的是捍卫立宪主义。

此次运动中引人注目的学者学生团体包括“阻止战争1000人委员会”“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自由与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 SEALDs)等。2014年2月,大江健三郎、大田昌秀、奥平康弘、佐高信等16位知名人士发起“阻止战争1000人委员会”,召集人包括学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生、志愿者,以及“东京市民意见30之会”、原水禁、“和平人权环境论坛”和日本基督教协会等组织的代表。截至2015年7月末,赞同其倡议书者已达2241人。^②2015年6月成立的“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由佐藤学、益川敏英、上野千鹤子、间宫阳介、内田树等60多名各界著名学者发起。除发表声明外,还组织“100所大学有志共同行动”等,要求废除违宪的安保法案。截至2015年8月末,赞同其倡议书的学者达13562人,市民达29164人。^③最后,于2015年5月3日正式成立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学生紧急行动”是以大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团体,每周五晚在国会前组织

① 例如,2015年8月30日,全国300多地举行抗议行动,国会前抗议民众达12万人。在各界努力的影响下,安倍内阁支持率大幅下降,安保法案的国会审议方针议程也有所改变。

② 「戦争をさせない1000人委員会」,http://www.anti-war.info/,2015-07-31。

③ 「安全保障関連法案に反対する学者の会」,http://anti-security-related-bill.jp/,2015-08-28。

安保法案抗议集会,并与“反对安保相关法案学者之会”共同举行游行和演讲会,在普遍认为“青年政治冷漠”的日本引起很大反响。这些团体以反安保法案为直接行动目标,但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立宪主义和国民主权的强调。

鉴于和平运动的多样性,以上挂一漏万的概述并不能展现其全貌。例如,由著名学者组成的“呼吁世界和平7人委员会”(1955年成立),以及曾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密切的“日本和平委员会”(1949年成立),都曾在和平运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宗教界人士也始终在积极开展和平运动,其中包括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平塔、参与当前反安保法集会的日本山妙法寺,由佛教·基督教·神道等各界人士组成的日本宗教者和平运动协议会(1951年成立)与日本宗教者和平协议会(1962年成立),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活动目标更具体的组织,如“ABC企画委员会”(1999年成立)主张反省侵略战争、反对一切战争行为、废除核生化武器(ABC),并举办“731部队展”和“毒气展”,支援战后赔偿诉讼,推进“731部队遗址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虽然战后日本和平运动中的思想往往会被统一看作“和平主义”,但和平运动的指导思想实际并不仅限于“非战、非武装、非暴力”意义上的“和平主义”。即使是广义上的“和平主义”,也在和平运动中体现出与前述分期的概括不同的特点。从“和平主义”与各思想主题关联的角度看,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所体现出的思想脉络可大致归纳如下: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前期,“和平主义”主要与民主主义(尤其是国民主权原则)紧密关联,和平运动与左翼运动的关联也最为密切(但不能等同于左翼运动)。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和平主义”更多体现出与市民社会思想的关联,追求超越现存的国家一个人关系和国家间的界限,主张保障基本自由与人权。与此同时,虽然知识分子仍在提出“和平主义”与战争责任的关联问题,但“个体生活中心主义”对“和平主义”的存在方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1世纪以来,“和平主义”相对凸显了“非战非暴力”的内容,与立宪主义的关联在日渐加强。和平运动吸收了此前阶段的市民社会精神,年轻一代从自身感觉出发的努力虽不能直接等同于战争责任意识,但基于主体性捍卫民主的诉求与“和平民主时代”形成了某种呼应。

三、战后的“积极的和平主义”

近年来，“积极的和平主义”成为日本政治外交的关键词之一。但在政界保守势力宣扬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之外，在国民中还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

1. 政界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除“价值观外交”“海洋国家”“战略性外交”外，另一个被反复强调的概念是“积极的和平主义”。2013年10月，安倍在其施政演说中，第一次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不只是主张国际协调的概念，而是要成为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积极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的国家。我相信，积极的和平主义才是我国应当肩负的21世纪的旗帜”。^①

何谓“积极的和平主义”？2013年11月，内阁官房参事谷内正太郎称，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主要方针，“积极的和平主义也被译作‘More proactive contribution to peace’吧。这传达出了想法的细微差别，但跟日语‘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语感是稍有不同的。……不再是过去的一国和平主义，不再是那种‘只需要守卫本国的和平安全，不参与世界纷争或卷入其他事情，只要自己幸福就可以了’的想法，而是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全做出贡献，这就是积极的和平主义的含意。具体而言，有PKO和国际和平合作等等，或者更广泛地，要在ODA和人的安全保障方面积极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是这样一种想法”。^②谷内还表示，安倍所谓“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其基本的想法就是刚才所说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具体包括重视价值观和积极开拓市场，而主要的外交课题有强化美日同盟、日中关系、日韩日朝关系、北方领土等。^③

有学者指出，“积极的和平主义”概念至少可溯至2004年4月“日本国际论坛”的《新世界秩序与日美同盟的未来》报告书，该报告认为，应由战后主张

①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の所信についての演説」、衆議院本会議の会議録、第185回（臨時会）第1号（平成25年10月15日）、衆議院、http://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8520131015001.htm。第一次安倍内阁已在强调“国际贡献”“建设和平”“集体自卫权”“修改宪法”。2013年7月起，安倍在首脑会谈中为“集体自卫权”谋求理解，其后多次提及“积极的和平主义”。在2014年解禁集体自卫权前夕，除对非洲国家和太平洋岛国外，安倍几乎在所有首脑访问会谈中均提及“积极的和平主义”，并非常关注对方的回应。2015年6月前则开始为安保法制进行宣传。

② 谷内正太郎「安倍政権の対アジア？米国外交」『東亜』2014年1月号、13頁。

③ 谷内正太郎「安倍政権の対アジア？米国外交」、15—19頁。

赎罪、不再犯错的“消极的和平主义”转为“积极的和平主义”，表示这虽可通过对宪法前言的解释改宪实现，但希望能正式修改宪法。相关主张则可溯至1992年2月的自民党“小泽(一郎)调查会”提案和1991年11月青山学院大学教授伊藤宪一的相关著作。^①

实际上,在此之前,猪木正道在1991年1月的文章中亦称,“我们现在必须从被动的、消极的和平主义向能动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跃进”,为此,必须修改自卫队法、制订非常事态法等。而其动力之一是“考虑到我国石油进口七成都来自该地域,若对萨达姆的野心置之不理,就是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自我否定”。但猪木认为修改宪法在实际上近乎不可能,这应是在日本作为能动积极的和平国家为世界所知之后的课题,此前政府应努力推动国民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②

作为“积极的和平主义”政策的代表者,安倍与小泽一郎虽然都主张海外派兵、更加“自主”,但存在如下区别。首先,“国际协调主义”的侧重不同。小泽更强调以联合国行动为中心,并认为这与美日同盟并不矛盾,若美国有扰乱联合国秩序的行为,日本作为盟国可以向美提出忠告。安倍虽亦寻求突破战后体制,但更多表现出对美日同盟基轴的倚重。其次,对海外派兵条件的限定不同。小泽表示:“行使自卫权(行使武力)限于我国直接受到武力攻击的情况,或若对我国周边事态置之不理日本将可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日本派遣军队协助该国行使自卫权是不允许的。但与此同时,积极参加联合国行动,即使是结果上包含武力行使,也不与宪法相抵触,而是符合宪法理念的。……当然,具体在何种领域以何种形式何种程度参加,将由当时政府的政治判断来决定。”^③安倍除谋求明确的“集体自卫权解禁”外,扩大了武力行使的条件及范围,事实上可使自卫队出现在基于美国世界战略的战争前线。最后,对宪法的态度有所不同。小泽强调“国际贡献”并曾提出修宪案(1999年),但也称“日本国宪法的理念和第九条的想法没有必要改变,反而应该忠实地实现。”他的逻辑是,“联合国和平活动是超越了作为国家主权的自卫权的。因此,联合国和平活动即使包含武力的行使,也不与日本国

① 金子将史「積極的平和主義の系譜」(2014年2月24日)、PHP online、<http://shuchi.php.co.jp/article/1823>、2015年9月1日。

② 猪木正道「積極的平和主義への転換」『this is 読売』1991年1月号、103頁。

③ 小沢一郎「今こそ国際安全保障の原則確立を」『世界』2007年11月号、149—151頁。

宪法相抵触,这是我的宪法解释。”^①而安倍积极推进改宪,受挫后转向“96条先行改宪”“解释改宪”,安保法案被小泽批评为“明显违宪”。^②

值得注意的是,消除贫困、“政府开发援助”和“人的安全保障”等都被当作“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政策内容,但有学者指出,“政府开发援助”作为“综合安全保障”的一环被实际用于带有军事色彩的战略援助,反而有助长“结构暴力”的倾向,不仅违反宪法和平主义,也侵害了日本国民的和平生存权和纳税者基本权。^③2014年6月,“关于重订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的有识者恳谈会”向外务大臣提交报告书,提议将“政府开发援助(ODA)大纲”更名为“开发合作大纲”,并以军队亦从事救灾等活动为由,主张不能一律排除与军队相关的援助。有学者批评说,这不仅是对日本志愿者努力创造的“和平国家”形象的抛弃,也会造成援助被用于战场、资金不透明等问题,在“反恐”名义下的相关政策反而将使问题更加恶化。^④

概言之,该意义上的“积极的和平主义”虽各有不同逻辑,但都强调日本要有更大的“国际贡献”,尤其是以武力方式体现的“贡献”,其背后存在着日本要更加“自主”“有力”的诉求。安倍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借战后既存相关提法谋求实质性改宪,其实践体现的是对美追随、先发制人的“武装安全保障”,从手段到目的都是对“和平主义”的否定。

2. 民众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事实上,战后日本还存在着另一种“积极的和平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提出了“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的概念,指出由于存在“结构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在非战争状态的“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之外,还应当通过积极行动消除贫困、压迫、歧视(以和平的方式)。这一理念成为世界范围和平学研究的基础。战后初期,日本国民“防止战争重演”的努力虽与此有所不同,但有

① 小沢一郎「今こそ国際安全保障の原則確立を」、153頁、151頁。小泽称这是国际法学者横田喜三郎阐述的理论。但有学者指出,横田也有结合宪法前文对“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表述,但并未像小泽那样突出对联合国提供武力方面的协助;而“联合国行动是日本的非主权行为”论的原型来自内閣法制局长官(1954—1964)林修三。并且,即使“宪法前文提示了积极和平主义”的解释可以成立,也不能认为前文对第九条自身的解释构成制约。参见阪口規純「湾岸戦争後の日本の安全保障論議に関する一考察:小沢一郎?自由党党首の安全保障論を巡って」『国際公共政策研究』1999年9月号。

② 「代表 小沢一郎 安保関連法案審議の本質について(談話)」(2015年6月11日)、生活の党と山本太郎となかまたち、<http://www.seikatsu1.jp/activity/declaration/20150611.html>。

③ 参见清水雅彦「政府開発援助(ODA)に見る憲法の平和主義の理念と現実」『法学研究論集』1994年10月号。

④ 参见高橋清貴「積極的平和主義のもとでのODA」『自由と正義』2014年9月号。

识之士已提出：“如今只靠打倒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也是不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使他们能够如此驱遣权力的社会、经济条件，必须要彻底清除这些条件，决不允许其复活。”^①在此基础上，“积极和平”意义上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在日本知识分子和国民中有广泛的共鸣，同时也发展出了有日本自身特点的含义。

首先，“积极的和平主义”也包括为消除结构暴力做出国际贡献的内容。战后以来，除了被政府作为外交政策的政府开发援助或文化事业，许多日本民众以个人或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开展国际援助交流活动，实际做出了多种多样的贡献。例如，中村哲医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白沙瓦会”，最初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开展医疗活动，但目睹当地在轰炸中极度贫困、生存堪忧的状况，他开始挖掘水井，致力于解决当地饮水及粮食问题，以行动揭示了不同于日美政府“反恐战争”的道路，在日本及世界引起很大反响。此外，东京大学等各大大学的“人的安全保障”研究项目也在探索和平方式的“国际贡献”，并体现出与政府强调开发的政策方针不同的特点。有学者指出，从国际社会的常识来看，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安保体制的“积极的和平主义”是主张以武力寻求非战争状态，反而才是“消极的和平主义”。^②

其次，“积极的和平主义”可以意味着更彻底地强调“非战、非武装、非暴力”，与宪法精神紧密关联，并被认为是未来的方向。例如，千叶真指出：“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理提出了可以称之为彻底的和平主义的更加积极的和平主义，反对所有战争，以战争的违法化为诉求。”^③这里对“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诠释是与保守势力完全相反的。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行动”被当成了攻击宪法的借口，但在美国主导下的相关军事行动无助于解决冲突，无益于国际社会。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是通过军事力量来确保和平的体制，与日本宪法的理念存在差异。“宪法建立在与《联合国宪章》异质的原理之上，以这种独特性为基础，扩大彻底的非军事思想的优位性，这样的努力对于日本民主主义的实现将越来越重要。”^④在近期的

① 吉野源三郎「編者のことば」『危機はここまで来ている』厚文社1954年、270—271頁。

② 参见谷川昌幸「自称「右翼軍国主義者」の「積極的平和主義」：安倍首相の国連演説」(ネパール評論、<https://nepalreview.wordpress.com/2013/10/01/a-620/>、2015年9月1日)等。

③ 千葉真「戦後日本の憲法平和主義の一考察」、183頁。

④ 田中則夫「平和主義の射程——国際法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法の科学』(第27号)日本評論社1998年、106頁。

反安保法集会中,普通民众也在以“宪法九条世界之宝”等标语呼应着这种积极的理念。

最后,“积极的和平主义”还可以意味着对战争责任的真正反思,并从国家一个人关系的角度对反思整个近代国家体制提供了线索。例如,关东学院大学教授林博史在考察战后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基础上指出,“我并不否定绝对和平主义本身,但达到这一认识的方式过程应当是重要的”“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是支持和平宪法与将日本的战争责任暧昧化这两者的结合”“如果能在追究战争犯罪、战争责任的情况下达到这样的认识,不是可以造就更不一样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吗?应该从现在起重新开始改变不是吗?”^①神户大学教授和田进则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为国内问题的九条与作为国际问题的九条的比重发生了变化,也出现了主张对内和平民主、对外以军事行动维持国际秩序的“帝国主义市民”意识。但是,宪法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意识之上的,其原理是要告别以“军事防卫国家”为前提的近代立宪主义和国民国家体制,确立超越国家界限的世界民众的和平生存权,是要“在展望‘世界和平’的同时实现‘国际和平’”。^②这种从根本制度层面上反思“国民国家”和“经济、贸易、开发”的和平主义理念具有积极的前沿性意义。

结 语

概言之,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具有丰富多样的内涵和实践,既有“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基本内容,也有与“和平”“和平状态”等不加区别地使用的形态。特定的“和平主义”主张可以由其对自卫权、战争责任等问题的回答相互区别,除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外,也需要关注其背后的思想逻辑。战后以来,“非战、非武装、非暴力”的“和平主义”在不同时期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立宪主义等有着具体的关联,作为意识与运动都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过程发挥了重大影响,未来也仍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目前,政界保守势力有意将“积极和平”的概念偷换为“积极的和平主

① 林博史「BC級戦犯裁判」岩波新書2005年、212—213頁。

② 和田進「平和主義論の課題」『法の科学』(第27号)日本評論社1998年、90—95頁。

义”,用以为行使武力提供借口。但日本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真正的“积极的和平主义”,从反对战争到消除结构暴力,从反思战争责任到思考日本乃至世界政治的根本性问题,体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从这种“积极的和平主义”来看,政府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反而才是“消极的和平主义”(此处的“和平主义”已不能称之为“目标上的和平主义”,而只是“非战争状态”甚至“战争状态”)。在日本现行政治体制下,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的相关诉求虽难以直接转变为政策,但如果没有这些持续的努力,战后宪法精神与和平状态的存续是不可想象的。在目前在野党国会席位相当有限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实际上成为了抗衡政界保守势力的关键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对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切实的,也将是长远深刻的。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security coope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free trade zones,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etc. China and Japan can build mutual trust; eliminate historical hatred; and maintain peace in East Asia with those exchange programs.

“Pacifism” (Heiwashugi) and “Positive Pacifism”

(Sekkyokuteki Heiwashugi) in Post-WWII

Japan *Qiu Jing* (45)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s of Japanese pacifism after World War II are in controversy. The concept includes “non-war, non-military, and non-violence,” which are exchangeable with the term of “peace” or “pacifism” in Japa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Japan cherishes peace but evades its war responsibility. The Japanese definitions of “pacifism” are not the same as the term’s common concept. Japanese pacifism movement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concept of “non-war, non-military, and non-violenc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pacifism movements, “pacifism” was correlated with various social thoughts, such as democracy, liberalism, and constitutionalism. Recently, Japanese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have proposed “positive pacifism.” Al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positive pacifism” varies among those icon politicians, those definitions reverse their original meaning. Meanwhile, Japanese society’s perception on the term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government. The current pacifism and its movement should be emphasized since it could be a social pressure to balance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Net uyo” in Japan *Pan Nini* (64)

“Net uyo” (online rightists) in Japan has been organized as collective actions in public instead of expressions on the Internet. The “net uyo” is ultra-exclusivism, which marginalizes them as in a lower social status. Those who maneuver discourses on the Internet and in civil society constantly identify themselves as ordinary people. The rightist consciousnes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do not come from nowhere but from the consequence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in Japan have disintegrated the middle class and generated individualism, which have provoked the extremist thought and actions. The transformation